

致 謝

能夠得到多位老師的指導，我深感幸運。我在耶魯大學讀本科時，有幸在周雨和孔杰 (George Krompacky) 的引領下走進中文的世界，更獲得首批萊特獎學金 (Richard U. Light Fellowship) 的資助前往北京學習。多年之後的2014年，我在母校的聽眾席上再次看到周老師和蘇煒老師的身影，不禁心潮澎湃。在歷史系的研討會上，約翰·德莫斯教授 (John Demos) 向我們傳授歷史學家的研究技藝，約翰·加迪斯教授 (John Gaddis) 鼓勵我們真正以一個歷史學家的視角思考問題，史景遷教授 (Jonathan Spence) 則以他精彩的故事激發了我前往中國的興趣。畢業後，我在雅禮協會教學研究獎金的支持下，前往長沙工作了兩年；至今，我仍受益於那裏的老師和學生。

非常感謝我在哈佛的導師。首先要感謝孔飛力教授 (Philip Kuhn)，他是教學和學術的楷模，多麼希望他在生前就能看到本書的出版。柯偉林教授 (William Kirby) 向我介紹了上海當地的連絡人，並始終鼓勵我繼續研究。沈艾娣教授 (Henrietta Harrison) 體貼的反饋和淵博的學識為我樹立了極高的標竿。除了我的論文委員會，斯文·貝克特教授 (Sven Beckert)、包弼德教授 (Peter Bol) 和入江昭教授提供了來自其他領域的洞見，豐富了我的學習經歷。我很榮幸能在包弼德教授和歐

立德教授 (Mark Elliott) 的指導下開始講授「稻田課」。¹ 華若璧教授 (Rubie Watson) 仔細閱讀了論文中的一個章節，並激勵我闡明和完善論點。

本書的研究工作獲得了許多機構與個人的幫助。我要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和馮氏圖書館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尤其是南茜·赫斯特 (Nancy Hearst) 的幫忙。我大部分檔案工作是在上海市檔案館和上海市圖書館完成的。除了館內的工作人員，我還要感謝當時任職於黃浦區人民政府的沈祖煒和黃浦區檔案館的胡遠傑。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段煉、金大陸和馬軍總是熱情相待，解答了我的許多問題。許多受訪者分享了他們的回憶與看法，大多數人的身分都必須保密，但其中我特別感謝上海博物館的李俊傑和鍾銀蘭、上海宣傳畫藝術中心的楊培明以及《文匯報》的鄭重。我還要感謝肯塔基大學圖書館的朱迪·富蓋特 (Judy Fugate)、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李露絲 (Louise Jones) 和大學服務中心的高琦，以及耶魯大學圖書館的孟振華和李唐。

我的許多工作單位都給予了慷慨的學術和資金支持。在研究生階段，我獲得了外語和地區研究獎學金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 的支持，還得到了來自哈佛大學歷史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以及美國富布賴特學生項目 (Fulbright U.S. Student Program) 的資助。在肯塔基大學，得益於研究和會議津貼，我每年都能前往中國做研究。至於學術團體與朋友，我要感謝肯塔基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們，特別是系主任弗朗茜·蔡森－洛佩茲教授 (Francie Chassen-López) 和凱倫·佩羅內 (Karen Petrone)，以及我的導師凱西·克恩 (Kathi Kern) 和格雷琴·斯塔－勒博 (Gretchen Starr-Lebeau)。在現代和古典語言方面，我和羅靚、馬特·威爾斯 (Matt Wells) 組成了「三人幫」，常常邊喝咖啡邊交流工作，相互鼓勵。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同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

1 編註：「稻田課」(Rice Paddies) 即為近代東亞文化課，由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和賴肖爾 (Edwin O. Reischauer) 於 1930 年代創設，旨在全面介紹中國、日本以及後來的韓國和東南亞的歷史和文化。

區政府的直撥研究經費項目和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專案編號：14403714）。我還要感謝耶魯大學歷史系，尤其是格蘭達·吉爾摩（Glenda Gilmore）和娜奧米·拉莫雷（Naomi Lamoreaux），感謝她們在2016年2月安排了一次關於本書的座談會。耶魯大學的弗雷德里克·希爾斯出版基金（Frederick W. Hilles Publication Fund）為本書的出版提供了資助。最後，我對為本書做出貢獻的學生們深表感謝：方博、郭念之、黃麗玲、李瑩、劉心怡、劉瑩、周雅文和方妍梅（Annemarelle van Schayik）。我也很感謝王雪兒為本書設計了封面。

多年以來，許多學者的文本細讀和嚴謹發問影響了我的想法。在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各位聽眾、座談小組成員以及以下討論者都讓我受益匪淺：陳庭梅、陳小眉、賀蕭（Gail Hershatter）、張倩雯（Rebecca Nedostup）、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華若璧。我也感謝在學術研討會上朗讀了本書節選的學者們：安雅蘭（Julia Andrews）、包蘇珊（Susan Brownell）、戴蒙德（Neil Diamant）、賴德霖、盧飛麗（Felicity Luftkin）、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沈暎一、陳美鳳和汪悅進。感謝來自以下機構的觀眾們在伯里亞學院給我提出的寶貴意見：亞洲研究所、印第安那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香港大學、肯塔基大學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我要特別感謝戴慧思（Deborah Davis）、鄧騰克（Kirk Denton）、韓森（Valerie Hansen）、沈艾娣、李潔、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濮德培（Peter Perdue）、裴宜理、舒喜樂、華若璧、吳一慶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審稿人，感謝他們閱讀了整個書稿並提供了詳細的反饋意見。我還要感謝南茜·赫斯特一流的編輯工作。劍橋大學出版社的露西·萊默（Lucy Rhymer）及其團隊以專業的精神和技術完成了本書英文版的出版工作；我對他們以及叢書編輯們的熱情深表感謝。

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收錄於由李傑、張恩華主編的《中國的紅色遺產：共產主義革命的文化遺魂》（*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16）。第六章部分內容基於第207期《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的〈革命古代：文革中的上海文化官僚機構，1966–1968年〉（“Revolutionizing Antiquity: The 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非常感謝原出版商惠允使用以上章節。

我的同學和朋友們的學術研究和親身經歷，都時刻激勵著我。致女歷史迷們：貝茜·莫爾(Betsy More)、弗妮·奧利維羅(Vernie Oliveiro)、哈莫妮·奧洛克(Harmony O'Rourke)和茱麗葉·瓦格納(Juliet Wagner)，願你們書寫歷史、創造歷史。克莉斯汀·波林(Kristin Poling)不但與我在肯塔基州的諾林湖畔度過了一週珍貴無比的思考時光，更為本書英文版提議書名。我還與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建立了深切的友誼，包括：李悅歆(Jennifer Altehenger)、瑪格麗特·博伊廷(Margaret Boittin)、陳細晶、江建明(J. Brooks Jessup)、金由美、克里斯·萊頓(Chris Leighton)、李傑、林雲雅(Silvia Lindtner)、凌敏華、凱特·梅森(Kate Mason)、潘律、錢穎、梅格·里瑟米爾(Meg Rithmire)、羅坤(Cole Roskam)、宋柏萱、唐小兵、王瑾、吳曉和張樂翔。金恬是最優秀的學姐，我將與你一樣提攜後進，以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最後，我世界各地的朋友們，特別是阿爾戈·卡米尼(Argo Caminis)、賴禾秀和阿瑞歐·索坦(Areio Soltan)，曾與我同桌共餐，分享歡樂——我欠大家一場盛宴。

家人是我最大的財富。我要感謝妹妹何若儀，她始終與我並肩，以高標準要求我們所有人。妹妹何若欣則以她的好奇心和覺察力，幫助我堅持真實的自我。弟弟何國樑在追夢的同時，也不忘始終支持我的夢想。我的兄弟姐妹能成為如此優秀的人，在世界上播撒善意，我為他們感到驕傲。自2010年以來，無論身在何處，有亞歷克斯·萊丁(Alex Ledin)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感謝他與我執手相依相伴。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亦是我的啟蒙老師——何志勤和樂翠珠。